



创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雷强舒丹

摘要：1939年，《法文研究》由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编辑发行，1941年改由中法汉学研究所《法文研究》组负责。1943年终刊时，共发行36期，其内容注重法国文学家及代表作品的介绍，形式上则包括学术论文、译文、书评、文法讲义等。该刊撰稿群由中法两国人员组成，其中沈宝基、曾觉之、鲍文蔚、张若名等人不仅具备深厚的国文功底，更在法国浸淫文学艺术多年，其眼界、译笔在民国时期的翻译界均属上乘。然而由于时局、个人诸多因素，不仅一手史料极为匮乏，对该刊的深入研究更是处于一片空白。本文基于36期刊物实体，并尽可能汇集相关资料，从译介对象、作家范围（时期、流派）、译者等方面，在民国法国文学翻译史这一层面对《法文研究》予以客观的介绍和评价。

关键词：法文研究 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 中法汉学研究所

一、前言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民国时期中法双语刊物《法文研究》（*Études Françaises*）的专门研究仍属空白，仅在两种文章中偶有涉及，一是回忆前辈学者的文章，如鲍劲源《缀忆汉学家铎尔孟》、姚小平根据鲍晓娜口述撰写的《波峰浪谷间的鲍文蔚》；二是研究中法教育基金会、中法大学的论文中大都简要提及，如葛夫平专著《中法文化教育合作事业研究》及其相关论文、窦坤《中法汉学研究所与中法文化交流述略》。另外，中国现代文学馆馆员北塔撰写的“沈宝基教授与《法文研究》”，是迄今为止唯一一篇以此刊物为题名的学术论文。然而，囿于一手史

创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法文研究》评介

347

料的匮乏，以上这些论述均有遗漏、错误之处，笔者希望本文可以更为全面、客观地展现该份刊物的面貌及其历史地位。

二、隶属与发行概述

1939年11月，《法文研究》在北京创刊，至1943年11月停刊。前三卷由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出版，定为月刊，但每年七、八月会休刊，1943年1月，第四卷第一期起改隶中法汉学研究所^①，并改为双月刊，持续一年，故共发行四卷三十六期。

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Bureau Franco-Chinois de publications）是中法教育基金（即法国庚子赔款退款）的经事业之一，其前身为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Office Franco-Chinoise de Publication）^②。据《法文研究》原刊可知，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会址为“北京西交民巷七一号”，而此处恰为中法教育基金会会址，由此亦可看出《法文研究》与中法教育基金会的密切关系。现在已公开的史料中，可以查证中法教育基金会对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资助的记录只有两则：1939年9月

① 杨再道（杨堃、张若名二人的长子）认为：《法文研究》改隶中法汉学研究所是在1941年年底，燕京大学被迫关闭时。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时至1942年10月第3卷第10期刊行时，《法文研究》仍由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北京西交民巷）出版。参见杨再道编：《张若名研究资料》，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5年，第95页。

② 葛夫平在其专著《中法文化教育合作事业研究（1912—1949）》一书中认为：“1939年2月，受日本侵华战争影响，经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中法两国代表团主席共同决定，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改组为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这一说法是值得商榷的。虽然1935年9月出版的江绍源著《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其编者仍称“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但自1936年起该所编辑的书籍，如郭鼎堂（郭沫若）著《先秦天道观之进展》、〔法〕佐拉（左拉）著《卢贡家族的家运》、〔日〕林谦三著《隋唐燕乐调研究》等就已经不再使用“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之名，全部改称“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这意味着更名之实远在卢沟桥事变前就已发生。此外，1936年11月5日，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中国代表团召开第三十次会议，沈尹默作为该项事务主持者，表示因未作交换工作，提议改为“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法文名称则不用更替，该议备案。参见葛夫平：《中法文化教育合作事业研究（1912—1949）》，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373页；文俊雄、刘长秀选辑：《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中国代表团史料一组（上）》，南京：《民国档案》，2014年第4期，第23页。

1日，中法教育基金会中国代表团在重庆行政院召开第三十三次会议，李书华作为主席报告“根据法国代表团主席提议，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本年轻费平分有二，以一半寄北平作为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北平办事处（Bureau de Peiping de office Franco-Chinois de Publication）经费，并以该会委员铎尔孟先生为北平办事处主任（Directeur de Bureau de Peiping）。”^①1940年1月15日；中法教育基金会中国代表团在重庆行政院召开第三十五次会议，会议决定“本会在国内各事业，如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中法大学等及各受补助机关，均照常进行”。^②1942年下半年，中法教育基金会虽然有心继续资助并编制预算，但因为交通阻断，北京、上海等沦陷区的事业已经无法汇款，中法教育基金中方的支持到此为止。

1941年10月，在法国驻华大使戈思默（Cosme）的主持下，中法汉学研究所在东黄城根四十号前中法大学礼堂成立，随后逐步扩大工作内容和办公场所。在已有的研究中，通常将此所的筹设视作保全北京中法大学校产的一种有效途径，笔者亦赞同此点，且汉学所成立之始即“商得中法大学同意，急用该校中西文藏书。”^③改隶后，《法文研究》做出了如下调整：一是封面由前三卷的靛蓝色改成了粉白色；二是改月刊为双月刊；三是取消法文部分的书评及文法介绍；四是大幅增加“中文选读”（Lectures Chinoises），由之前的一篇变为三或四篇；四是编辑部地址随之移至东黄城根四十二号。其他则均保持旧有样式，未加更迭。

《法文研究》三十六期皆由北京北堂印字馆承印，该所为法国遣使会（Lazaristes）筹设，其印制书刊的历史可追溯到1864年。这种合作关系并没有在刊物实体上予以体现，笔者知悉该信息是因为该馆的方立中修士（Joseph van den Brandt）在1944年6月30日撰写了一篇

① 另一半经费则仍寄送上海，由沈尹默负责支配。参见文俊雄、刘长秀选辑：《中法教育基金会委员会中国代表团史料一组（上）》，南京：《民国档案》，2014年第4期，第30页。

② 同上书，第36页。

③ 中法汉学研究所编：《中法汉学研究所工作概况》，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1944年，第9页。

回忆文章，其中文译稿“八十年来之北京遣使会印书馆”刊登于中法汉学研究所出版的学术刊物《中法汉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该篇正文后附“北堂印书馆历年出版法文书简目”，其中明确标注了《法文研究》的出版信息^①。笔者认为，《法文研究》交由北堂印书馆刊印，固然是出于同属法国文化、学术团体的亲近感，但其他因素也应考虑，譬如其出版物“所用语文，有中、日、满、蒙、梵、藏、法、英、德、义、荷、班”^②，这直接证明该印书馆有齐备的法语铅字，可以完全胜任刊印一份法、中双语的文学刊物。

《法文研究》各期均注明了国内、越南、法国三地的全年定价，并印制了订阅单（Bulletin d'abonnement），换言之该刊在发行时即考虑了目标投放地，随着二次世界大战局势的不断深入，定价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变化幅度远未及物价增幅。此外，各期均在尾部页刊登东方汇理银行（Banque de L'Indochine）、中法工商银行（Banque Franco-Chinoise）广告，笔者认为这两家银行长期资助了该刊，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法教育基金会资助的不足。

三、撰稿人分析

（一）同人群体

1940年，在上海出版发行的《西洋文学》第3期，刊登了一篇署名为“尉迟速”撰写的介绍文章“法文研究月刊”。这篇文章虽然只有两页，但介绍的颇为准确，在发行周期、栏目设置、价格因素等方面均有涉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文特别指出《法文研究》“同人刊物”^③的特性，这一说法并非撰者的主观臆断，而是确有史料支撑的。

① 方立中撰：“八十年来之北京遣使会印书馆”，参见中法汉学研究所编：《中法汉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第1期，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1945年，第137页。

② 同上书，第129页。

③ 参见《西洋文学》，第1卷第3期，上海：上海西洋文学社，第382页。

1937年10月29日《吴宓日记》中曾有如下记录：“旋杨堃、张若名夫妇招宴于永华园饭庄，到者皆法文会同人，而孙福熙及其夫人刘雪亚，曾觉之夫妇等亦在座。”^①由此可知，在卢沟桥事变后，留守北京的知识分子中确有一个社团组织，其旨趣在于法国文学（文化），并常常聚会。

根据《法文研究》登载文章的实际情况，沈宝基、曾觉之、张若名、鲍文蔚、郭麟阁、张莫亚六人的稿件数量最大，且均留在北京任教，因此可以大致判定他们为同人社团的成员，其中有四位为里昂中法大学的学生，而鲍文蔚、张莫亚两人同样有留法学习的经历，具体情况如下：

表一 里昂中法大学学生^②

姓名	入学时间	离校时间	博士论文	抗战爆发时的任教情况
曾觉之	1921年10月16日	1929年1月1日	无	中法大学文学院教授兼文学（中文）系主任
张若名	1927年10月16日	1930年12月20日	L' attitude d' André Gide, essai d' analyse psychologique	中法大学文学院教授
沈宝基	1928年11月10日	1934年4月20日	Si Syang Ki, Thèse Soutenue	中法大学文学院讲师，附属高级中学法文教员
郭麟阁	1928年11月10日	1935年7月12日	Essai sur le Hong Leou Mong (le Rêve dans le Pavillon rouge) célèbre roman chinoise du XVIIIe siècle	中法大学附属高级中学法文教员

① 吴宓将10月29日至11月3日日统录在一起，并非如惯例每日分列，本次宴请虽然录在29日，但应该是31日晚上7至9时举行的，笔者特此说明。

② 该表格信息参照 Liste des étudiants de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此外，稿件作者中还有一位里昂中法大学毕业生——徐仲（颂）年，他的入学时间为1921年10月4日，1930年7月31日离校，博士论文题目为 Li Thai-po, son temps, sa vie et son oeuvre。但徐仲年只发表了一篇文章“拉马丁诗选”，刊于第2卷第5期，且当时并不在北京教书，故未列入同人表格。

鲍文蔚，1928年赴法留学，在格勒诺布尔大学学习法国古典文学及欧洲近代文学，获得“古典文学学士”学位，曾任中法大学附属高级中学法文教员，后转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①。而有关张莫亚史料留存甚少，只能考证他（她）曾为北京大学学生，1934年曾受中法教育基金资助赴法留学^②。

（二）投稿人

在同人团体外，《法文研究》还有其他投稿人，他们大都是留守北京的私立中法大学、私立辅仁大学、私立燕京大学文科院系的老师和学生，这其中有些以真名发表文章，有些则以笔名示人。其中可考者，笔者在此分别论述。

1. 张雁深。时在私立燕京大学图书馆任职，其岳父为日本著名学者鸟居龙藏。撰“张若名著《纪德的态度》”（第1卷9期）。

2. 戚佑烈。山东文登人，1928年考入天津南开高级中学，后入南开大学英语系。1932年转入燕京大学文学院欧洲文学系攻读法国文学。1935年9月赴瑞士纽沙德尔大学留学，1938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9月入巴黎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其论文题目为“狄德罗和百科全书所见的中国”。后因欧战爆发，于1941年2月被迫归国，在北京教书。撰“卢梭忏悔录选注”（第3卷第4期）。

3. 王兰馥。应为私立辅仁大学毕业生，常在《辅仁文苑》发表文章。撰书评“李劫人译小物件”（第2卷10期）。

4. 丁竹铭。原名丁秉勋，字竹铭，曾任中法大学帮注册员^③。撰书评“穆木天译窄门”（一卷六期）、书评“郑伯奇译鲁森堡之一夜”（第3卷第3期）。

① 参见私立中法大学编：《私立中法大学教职员录》，北京：私立中法大学，1937年，第14页；北京大学文学院编：《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一览》，北京：北京大学文学院，1940年，第121页。

② 参见文俊雄、刘长秀选辑：《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中国代表团史料一组（下）》，南京：《民国档案》，2015年第2期，第25页。

③ 私立中法大学编：《私立中法大学教职员录》，第3页。

5. 袁民宝。曾任中法大学教授^①，译冒辟疆《影梅庵忆语》（“Souvenirs de la Masure à l'Ombre des Pruniers”，第4卷第3期）。

6. 江绍源，笔名为“森友三”^②。撰书评“译罗贝氏韵文民间故事集自序兼评其散文诸故事中文三译本”（第2卷第8期）。

7. 高名凯和甘茂德（J. M. Kermadec）。二人均为中法汉学研究所研究员。在《汉语语法论》的自序中，高名凯提及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任教的燕京大学被日军查封，只好迁居北平城里，“同时又应了法国朋友杜伯秋先生（J. P. Dubosc）的约请，担任中法汉学研究所的研究职务。我每日到所和甘茂德子爵（Vicomte de Kermadec）共同研究中国文字，翻译中国小文”^③。这两人合译的文章有：李复言《杜子春传》（“Histoire de Tou Tse-Tch'ouen”，三卷九期）、李华《吊古战场文》（“Lamentation sur un ancien champ de bataille”，第3卷第5期）、李陵《答苏武书》（“Réponse à Sou Wou”，第4卷第5期）、张明弼《冒姬董小宛传》（“Histoire de Tong Hsiao-wan”，第4卷第4期）。

8. 李熙祖和时来麦（C. Schlemmer）。李熙祖曾在中法大学附属高级中学任教^④，时来麦为中法汉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二人合译苏轼《赤壁赋》（“La Falaise Rouge”，第3卷第4期）、钟毓龙编《上古神话演义》（“La Naissance miraculeuse de Heou Tsi”，第3卷7—8期）、袁宏道《畜促织》（“L'Elevage des Grillons”，第3卷第10期）、许尧佐《柳氏传》（“Histoire de Dame Saule”，第4卷第2期）、《战国策·荆轲刺秦王》（“L'Attentat de King-k'o”，*Tchan kouo tch'o*，第4卷第3期）。

9. 克洛代尔（Paul Claudel，1868—1955）。译李白、卢纶、贺知章等“唐诗十一首”（D'après le Chinois，第2卷第5期）。

10. 吴益泰。华人旅法学者。译陶潜《与子俨等疏》（“Lettre à ses

① 私立中法大学编：《私立中法大学教职员录》，第6页。

② 参见董毅：《北平日记》卷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78页。

③ 参见高名凯：《汉语语法论》，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第7页。

④ 其具体职务为丙部主任兼法文专任教员，参见私立中法大学编：《私立中法大学教职员录》，第23页。

fil”，第4卷第2期）、郑燮《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二书》（“Lettre à son Frère”，第4卷第6期）。

恕笔者见识有限，其他投稿人几乎无从考证，他们分别是：马凤阁、姜慕曾、金铎、倪令仪、泉楚、幸人、嵇沉珠、一照、文心、老燕、明梵、斯藕丝、伊零一。

（三）其他稿件的撰写者

在1935年1月编印的《中法教育基金会成立经过及其现状》中，铎尔孟（André d'Hormon）即已位列中法文化交流出版委员会，且为唯一一位法方委员，其他则为沈尹默、李石曾、李书华、刘锡昌四位中方委员。1935年3月出版的《现代》第6卷第2期刊登了一篇题为“中法文化交流出版委员会”的短讯，该文简单介绍该所工作近况，其中亦提到铎尔孟主持翻译江绍源的著作《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①，亦彰显了其在该委员会中的职责和参与程度。在抗战期间，铎尔孟作为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北京办事处主任，主持具体工作。《法文研究》“中文选读”一节，有以下九处译文并没有注明译者，以铎尔孟的个性和其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热爱，笔者认为它们皆由铎尔孟翻译，具体信息如下，

陶潜，归田园居（“Retour à la vie champêtre”），第2卷第2期

白居易，琵琶行（“Ballade de la Guitare”），第2卷第4期

无名氏，古诗孔雀东南飞（“Vers le sud-est un paon s'envole”），第2卷第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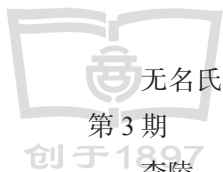
白居易，长恨歌（“Chant de l'Eternel Regret”），第2卷第8期

无名氏，古诗十九首（“Dix neuf poèmes anciens”），第2卷第9期至第3卷第2期

陶潜，归去来辞（“Couplets du Retour”），第3卷第3期

张衡，四愁诗（“Poèmes des Quatre chagrins”），第4卷第1期

^① 参见骆清：《中法文化交流出版委员会》，《现代》第六卷第二期，上海：《现代》杂志社，1935年，第354页。



无名氏，玉台新咏二首（“Deux Ballades anciennes”），第4卷第3期

李陵，与苏武诗三首（“Adieux à Sou Wou”），第4卷第5期

在“中文选读”部分，有一些译者在《法文研究》创刊前或相应卷期发行前即已去世，如德里文（Marquis d’Hervey de Saint-Denys，1822—1892）、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于纯璧（Alphonse Hubrecht C. M.，1883—1922）、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可以断定并无投稿行为，因此笔者认为他们四位各自的译文，“杜诗三首”（“Trois poèmes de Tou Fou”，第2卷第1期）、“秦刻石文六篇”（“Six Inscriptions”，第2卷第7期）、《三国志演义·宴桃园豪杰三结义》（*Le serment des Trois Braves, Roman des Trois Royaumes*，第3卷第6期）、《诗·卫风·氓》（*Cheu King, Chant de Pays de Wei: Le Paysan*，第2卷第3期）极有可能是铎尔孟从他们的著述中圈选发表的。此外，华义乐（P. Royère）译唐诗数篇，分别为“白居易诗五首”（“Pouo Kiu-yi Cinq Poèmes”，第4卷第2期）、“李白诗五首”（“Li Pouo Cinq Poèmes”，第4卷第4期）、“韦应物诗六首”（“Wei Ying-wou Six Poèmes”，第4卷第6期），恕笔者见识浅陋，并不知悉此为译者的真实身份。

四、栏目与内容

（一）概述

《法文研究》作为一份抗战期间在北京发行的双语刊物，其内容以纯文学为主，尤其偏重介绍法文作家、作品，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整个民国时期都有相当的特殊性。总体而言，该刊每期内容有以下几个单元设置：作家介绍、作品提要、名篇译注、译文连载、语法分析、译本品评，此外，在编辑过程中，该刊还增加了译文悬赏、中文选读等环节。在其创刊号卷首刊有“引言”，很好地道明了该刊的趣旨，

创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笔者将其重要部分抄录如下：

法国乃代表文明的某一方面，犹如中国，极重视文人，它最伟大的著作家亦即其最伟大的人物。其整个文化的内心趋向似因依于少数明宿的遥远之光照力。仅一孟戴业，仅一拉辛，足以亮澈广大的寰宇，韩波赋与现代文学以特种的敏感的色调。

中国文人最容易接受法国文学的感引，因此这一种文学的研究，在他眼中，亦最易显出意义。

“法文研究”即着重介绍法国文学大家，每期必有一位作家研究；其次注意现代文学的动向，翻译或评述法国文学名著与杂志上的创作或论文。

每期并有文法研究一二种，俾细心的读者，可略窥法文机构精妙的地方。

此外我们还要作一种书评，将法文著作的中文译本，尽力搜集，逐渐加以鉴赏。译得信达精雅的，应该郑重介绍，反之，敷衍了事的，亦应标而出之，希望有人重新努力。

这一“引言”应由主编执笔，其后附有中文译文，均未标注作者，笔者推测极可能由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北平办事处主任铎尔孟主笔。从摘录的引文片段可以看出，该刊的研究对象乃“伟大”的作家，亦为法国“伟大”的人物，足以“亮澈”及影响文学发展的举足轻重的巨匠。其后枚举的蒙田（孟戴业）、拉辛和兰（韩）波都陆续出现在第一年发行的期刊中。

除了关注法国经典作家、作品，笔者认为《法文研究》还深受一本名为 *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新法文杂志》）的法国文学刊物的影响。这份刊物首创于1909年，起初为月刊，二战期间被迫停刊，后于1953年复刊。该刊物专注于法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和研究，因不论派别一视同仁，故在文学界颇负盛名，其主要撰稿人有保罗·克洛岱

尔、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 1869—1951）、圣琼·佩斯（Saint-John Perse, 1887—1975）、让·史隆伯杰（Jean Schlumberger, 1877—1968）等。《法文研究》对这一作家群体也颇为关注。不但为前两位作家做了专题研究，还翻译了这本期刊上的一些文学评论^①。这也与引言中提到的“同时也关注当代文学动向”这一主旨相契合。根据以上线索，笔者《法文研究》的编辑团队在取材时注重作家和作品的文学价值，他们认为把这些文学大家介绍到中国是刊物的首要职责^②，而能否全文翻译作品或是精准做注释则并不是最为重要的标准。

（二）法文部分

除终刊的第四卷第六期外，《法文研究》每期均设一主题对象，以某一位作家为探讨的主旨，其详细信息如下：

表二

卷、期	主题对象	对象生卒年	主要撰写者
1 卷 1 期	韩波（Rimbaud）	1854—1891	沈宝基
1 卷 2 期	服尔德（Voltaire）	1694—1778	郭麟阁
1 卷 3 期	亚伦·富尼埃（Alain Fournier）	1886—1914	沈宝基
1 卷 4 期	拉辛（Racine）	1639—1699	沈宝基
1 卷 5 期	威尔伦（Paul Verlaine）	1844—1896	沈宝基
1 卷 6 期	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	鲍文蔚
1 卷 7 期	葛洛台（Paul Claudel）	1868—1955	沈宝基
1 卷 8 期	列兹主教（Cardinal de Retz）	1613—1679	曾觉之
1 卷 9 期	纪德（André Gide）	1869—1951	沈宝基

① 例如《法文研究》第2卷第2期杂志上刊登了曾觉之译让·史隆伯杰对高乃伊作品的评论《郭乃依》（“Corneille”），原文刊登于 *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1929年第192期；第3卷第3期刊登了沈宝基译保罗·瓦雷里（Paul Valéry）对马拉美作品的评论《关于马拉美的信》（“Lettre sur Mallarmé”），原文最先刊发于 *La Revue de Paris*（《巴黎杂志》）1927年4月第1期，后1932年瓦雷里又在 *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发表关于马拉美作品的评论。

② 《法文研究》为每期推荐的作家撰写了详细的生平介绍以及创作经历，是基于诸多法文资料完成的较为完备的研究，内容翔实。

续表

卷、期	主题对象	对象生卒年	主要撰写者
1 卷 10 期	孟戴业 (Montaigne)	1533—1592	曾觉之
2 卷 1 期	鲍特莱 (Baudelaire)	1821—1867	沈宝基
2 卷 2 期	郭乃依 (Corneille)	1606—1684	曾觉之
2 卷 3 期	弗洛孟登 (Eugène Fromentin)	1820—1876	沈宝基
2 卷 4 期	拉比莱 (François Rabelais)	1483—1553	曾觉之
2 卷 5 期	拉马丁 (Lamartine)	1790—1869	沈宝基
2 卷 6 期	拉布律叶尔 (Jean de la Bruyère)	1645—1696	姜慕曾
2 卷 7 期	巴莱斯 (Maurice Barrès)	1862—1923	郭麟阁
2 卷 8 期	龙沙 (Rierre de Ronsard)	1524—1585	沈宝基
2 卷 9 期	阿波里奈 (Guillaume Apollinaire)	1880—1918	沈宝基
2 卷 10 期	鲍舒埃 (Bossuet)	1627—1704	曾觉之
3 卷 1 期	普鲁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1922	曾觉之
3 卷 2 期	莫利哀 (Molière)	1622—1673	郭麟阁
3 卷 3 期	梵列利 (Paul Valéry)	1871—1945	沈宝基
3 卷 4 期	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鲍文蔚
3 卷 5 期	查理贝琦 (Charles Péguy)	1873—1914	沈宝基
3 卷 6 期	巴斯加 (Pascal)	1623—1662	曾觉之
3 卷 7 期	弗朗西斯若姆 (Francis Jammes)	1868—1938	沈宝基
3 卷 8 期	笛卡儿 (Descartes)	1596—1650	曾觉之
3 卷 9 期	摩利思赛孚 (Maurice Scève)	c. 1501— c. 1564	沈宝基
3 卷 10 期	皮丰 (Buffon)	1707—1788	鲍文蔚
4 卷 1 期	雨果 (Victor Hugo)	1802—1885	曾觉之
4 卷 2 期	嵇罗陀 (Jean Giraudoux)	1882—1944	沈宝基
4 卷 3 期	窦炳业 (Agrippa d'Aubigné)	1552—1630	曾觉之
4 卷 4 期	歇尼埃 (André Chénier)	1762—1794	沈宝基
4 卷 5 期	夏都伯利安 (Chateaubriand)	1768—1848	曾觉之
4 卷 6 期	无主题		

然而，这并不能涵盖《法文研究》法文部分所涉猎的范围。事实上，在主题对象外，各卷期以介绍、译注和书评等形式关注了大量作家作品。现代学人陈祚龙在《书文清话》^①中曾统计《法文研究》法文部分共译介、品评了一百〇五位作家，他们大都以法文写作，其中有作家、哲学家甚至自然科学家。

由于当时中国的法语文学翻译尚处起步阶段，翻译家们在驾驭诗歌、戏剧、或是年代较为久远的文学作品时有相当困难，而且他们也清醒地认识这一点^②，因此，《法文研究》的译注很多时候存在对原文理解不准确的地方。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些译者希望借助这本学术期刊对法国文学与翻译进行深入的探讨，而这一目标也在译本品评专栏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此，笔者选取了部分注释以及译作进行赏析。《法文研究》第1卷第10期介绍的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标志性哲学家蒙田，由曾觉之撰写其生平，并选其著作 *Les Essais*（《随笔集》）第一卷第二十五章“Du pédantisme”的片段做注释。曾觉之将题名译为“论教育”。虽然蒙田在这一篇文章中批判了当时教育制度的弊病，即老师仅满足于将肚里的知识吐出来给学生却不关心学生是否真正理解并由此培养出思考力和判断力；学生也不真正吸收知识而仅仅将其充塞记忆用来作为交谈时炫耀的资本。然而纵观全文，蒙田要表达的内涵并不仅局

① 参见陈祚龙：《书文清话》，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年，第315—327页。此文于1974年6月24日在法兰西远东学院写就，从其行文内容上可判定陈祚龙是仔细查看过《法文研究》全部期刊，除一些史实上的谬误外，篇目信息是十分准确的。

② 译者在撰写作家生平或是翻译相关文学评论时，时有提到作品文字有难度，难于理解，例如曾觉之在介绍的蒙田作品时说道：“至从文字上论，孟戴业是很大的艺术家，他完全以活活的影响表现他的思想……即以我们外国人来看，虽然这是十六世纪的文字，在文法字句上有某种困难，但以其思想之活跃，语句之生动，亦十分觉到某移人的力量。”（第1卷第10期）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曾觉之翻译的高乃伊文学评论：“高乃伊的作品对于一般大众水平的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再加之文法上的困难，以及语言的变迁……高乃伊正离我们远去。”（第2卷第2期）以及沈宝基翻译的马拉美文学评论当中也用“晦涩”一词形容其作品（第3卷月第3期）。说明翻译家们对所选题材的难度是有充分认识的。

限于此。他反对鹦鹉学舌式地死记硬背别人的看法和学识，而不陶冶自身的思想，提升自身的判断力，从而增长自身智慧的做法，并深入探讨了的知识与思想的关系。因此“Du pédantisme”若译成“论教育”则有些片面，参照2003年潘丽珍译本^①译为“论学究气”更为贴切。同样下文中的“Pédant”也不是指“教书先生”，而是指“学究”一类人。文中有另一个词“pédagogue”指的是教书先生，作者把这两个词都注释为“教书先生”显然有些许不妥。又如“Nous ne travaillons qu'à remplir la mémoire, et laissons l'entendement et la conscience vide.”和“A quoi faire la science, si l'entendement n'y est?”这两句话中的“entendement”被注释为“智慧”。第一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只注重让记忆装得满满的，却让理解力和意识一片空白”。第二句话大意为“如果没有理解能力，学问又有什么用处呢？”“entendement”应指“理解能力”，若译为“智慧”则体现不出作者所论述的“知识”与“理解力”之间的关系。此外，原文中还有一系列该词的近义词，如“sens”和“jugement”，译者也统统注释为“智慧”，这样显然不是很确切，应理解为“思想”和“判断力”比较恰当。除字词注释外，译者也针对某些难理解的句子解释了大意。例如“Protagoras proposait à ses disciples, était suivie: ou qu'ils le payassent selon son mot, ou qu'ils jurassent au temple, combien ils estimaient le profit qu'ils avaient reçu de sa discipline, et selon icelui satisfissent sa peine: mes pédagogues se trouveraient choués, s'étant remis au serment de mon expérience.”曾觉之注为“或照老师的说话付学费，或自己到神庙发誓，本自己在学校中所得的益处而付钱，若按这种办法，教我发誓，我的先生们都将得不到多少了。”在此，译文中大致意思的理解并无大碍，但是不太注重细节且语句有些生硬不够流畅。笔者认为，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法文研究》的译文当中。

^① 潘丽珍等译：《蒙田随笔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当然，笔者也注意到刊物上有些翻译作品不但意义准确、语句通顺、文字优美，且很好地反映出了原作的意境，完全达到了“信达雅”的水平。然而这些译作并不出自对刊物提供稿件数量较大的翻译家群体，而来自仅有一两篇发表的生平不详的译者，如徐仲年和“斯藕丝”。在此摘录第2卷第5期徐仲年翻译的拉马丁诗歌片段以供欣赏。

L'isolement	孤独
Souvent sur la montagne, à l'ombre du vieux chêne,	当那落阳衔山，我常常悲伤地 坐在
Au coucher du soleil, tristement je m'assieds ;	山顶古老橡树荫下；
Je promène au hasard mes regards sur la plaine,	我不经意地眺望平原，
Dont le tableau changeant se déroule à mes pieds,	平原的美景舒展于我足前。
Ici gronde le fleuve aux vague écumantes ;	此处，大江喷沫而怒吼，
Il serpente, et s'enfonce en un lointain obscur ;	它蜿蜒而驰，直没于苍茫中；
Là le lac immobile étend ses eaux dormantes	那里，静湖平铺着入睡之水
Où l'étoile du soir se lève dans l'azur.	金星由水面缓缓上升。

Au sommet de ces monts couronnés de bois sombres,	浓林罩此山头有如皇冠
Le crépuscule encore jette un dernier rayon ;	傍晚还吐出最后的光线
Et le char vaporeux de la reine des ombres	而夜后所乘的云雾之车，
Monte, et blanchit déjà les bords de l'horizon.	徐起东方，业已染白了天边。

总体来说，《法文研究》由于选材难度较大，超出了刊物主要翻译人员的一般水平，在理解原文、准确注释和译文的流畅性方面稍有欠缺。但是对于较为通俗易懂的小说、文学评论以及近代诗歌的翻译处理得相对较好，因此其中也不乏出类拔萃，值得仔细品评的译作。

(三) 中文部分

“中文选读”一栏始于《法文研究》第2卷第1期，自此在每期的后半部分出现，直到终刊从未间断。其选文时期上自《诗经》下至《红楼梦》；体裁涉及古文、汉魏古诗、魏晋神话志怪小说、唐传奇、明清章回体小说等等，尤其偏重唐诗；译者除了上文提到的人员外，还有沈宝基、鲍文蔚、张若名参与其中；每篇选文通常只用一期完结，但偶尔有连载出现，如第4卷1至4期将鲍文蔚译《红楼梦》第57回全文发表，实属不易。

这些译作不但完全忠实于原文，意思准确无遗漏、文字流畅优美，而且还尽可能地表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魅力，堪称翻译史上的佳作。在译文之外，译者还以脚注的形式对作者和作品的创作背景以及文中所涉及的地名、所引经典的出处和其它译法做了简要的注释。在此摘录第3卷第3期法译陶潜《归去来兮辞并序》片段以供赏析。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

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Allons, c'est le retour! Mes champs et mon jardin vont être envahis par les herbes, pourquoi ne pas rentrer?

Puisque, moi-même, aux appétits du corps, j'ai soumis mon âme asservie,

Vais-je rester encor, pleurant sur mes déboires, à m'affliger?

Je sais qu'aux torts passés il est vain de redire,

Mais que pour le futur on se peut amender.

Du moins n'ai-je pas, sur la fausse route, égaré trop avant mes pas,



Car je me sens, aujourd'hui dans le vrai, revenu des erreurs
d'hier...

Ma barque vogue, balancée par sa course légère,

La brise ondoie et, par bouffées, vient souffler dans ma robe.

J'interroge des voyageurs sur le chemin qu'il reste à faire,

Et j'en veux au trop lent matin de sa lueur encor si mince.

五、影响与意义

1943年11月发行的第4卷第6期，在其正文部分的最前端以法中双语公告——“本刊启事”，《法文研究》被迫停刊。究其停刊原因，主要由以下几项：

不过现在环境不容本刊延续此努力，因执笔人数有限，势必妨碍其他不能同时兼顾之翻译工作……

即此原与法文研究相辅并行之中文选读，自一九四四年起，占本刊之全部篇幅，法文研究部分暂停刊行。中法汉学研究所因此而得专攻于一类直属于其本格范围之工作，但尚希望法文研究有一日或由研究所本身，或由其他力能担任之出版者，得再发刊。

即客观环境、稿源枯竭、中法汉学研究所本职工作三大因素制约，纯文学性质的《法文研究》不得不暂停。接替其的出版品为该所发行的《艺文萃译》（*Lectures Chinoises*），而这份刊物亦只在1945年1月发行了一期即告结束，而中法汉学研究所自1944年出版的“本格”刊物——《汉学》（*Bulletin du Centre Franco-Chinois d'Études Sinologiques*）^①则一直持续到1951年才告结束。

^① 该所改称“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Université de Paris, Centre d'études sinologiques de Pékin），而《汉学》亦改称《汉学论丛》（*Mélanges Sinologiques*）。

《法文研究》出版发行后，就笔者所见及的史料似乎并未引起广泛关注。这与杂志本身定位——法语、纯文学性，以及战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持续扩张有密切关系。此外，笔者认为其印刷数量也是一重要的限制因素，其第1卷第1期留存于世者多为稍后重印本，极有可能是最初预设的发行量不敷同人馈赠、赠阅公藏机构之用，导致被迫加印。1939年《图书季刊》中文本在昆明复刊，在“期刊介绍”一栏刊登过两篇介绍文章，均由“敬”撰写，分别介绍第1卷1—2期和第1卷4—6期^①，其文并无特别之处，只作简要的内容介绍，并无任何评价。《图书季刊》由国立北平图书馆编辑发行，其介绍《法文研究》即以联络学界、公告学术动态为初衷，这并无特别之处。但在此之外，曾觉之1934年至1937年担任《图书季刊》英文本（*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的编辑，与国立北平图书馆颇有渊源，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北平与昆明间的通信往来均可通过香港转寄，且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此设有办事处，恕笔者揣测，这两次报道皆由曾觉之之寄赠样刊而来。除此之外，在已有的史料中可知的报道有，上海《申报》1943年6月7日、7月30日^②分别介绍了该刊，均列入中法汉学研究所名下，且并无特殊内容，只是基本描述。

笔者根据《中法教育界》、《中法大学月刊》等期刊尽可能比对了《法文研究》主要撰稿同人的文章和其在1939年以前发表的译作，发现几乎无相同之处，这意味着他们在编辑、撰写《法文研究》时，尽可能避免了以旧文敷衍，这种认真的态度值得今人赞扬。前文提到署名为“尉迟速”撰写介绍文章，他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洞察到《法文研究》选用了法国现代杂志上发表的文学作品，其中特别提到取材的杂志有 *Revue de Paris* 和 *La Nouvelle Revue Francaise*，这为当代学者追溯《法

① 参见《图书季刊》中文本新第2卷第1期，昆明：国立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编辑部，1940年，第126—127页；参见《图书季刊》中文本新第2卷第3期，昆明：国立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编辑部，1940年，第486—487页。

② 参见《申报》，1943年6月7日，第三版《故都学术界的一角：一个中立国的文化机关》；《申报》，1943年7月30日，第四版《中法汉学研究所概况》。

文研究》各期主题提供了很好的启示。此外，作者还指出了“同人刊物”的危险，希望可以扩大投稿群，避免对某一类文学流派（如象征主义和新象征主义）的偏好。

著名翻译家徐知免 1941 至 1945 年间就读于昆明中法大学法国文学系，他在回忆文章中曾写道：“《克洛代尔与〈认识东方〉》一文的开头写道：克洛代尔这位法国诗人在我国几乎不大被人提及，我只记得大概在三十年代北平出版的深蓝色封面的《法文研究》杂志中曾经对他有过一些简单介绍，以后就很难见到了。”因为种种原因，《法文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无人问津，而这一空白往往给相关学术研究，譬如中法交流史、译介学、汉学发展史，造成了断裂和误读^①。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法文研究》最为重要的价值之一是文献、史料本身，该刊可以视为由中法教育基金资助的学术刊物的一个分支，在特殊时期它汇聚了尽可能多的通晓法、中两种语言的翻译家，以他们对法国文学的热爱为基础，不遗余力地译介其中的代表人物、作品，并翻译中国文学、历史的经典篇目，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与此同时，《法文研究》见证了中法两国学者在困难时期相互扶持、不离不弃，其中的中方学者更是尽可能维护国家财产并保持民族气节^②，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① 譬如有学者认为张若名在 1937 年发表的《法国象征派三大诗人鲍德莱尔，魏尔莱诺与蓝苞》是“中国在解放以前象征主义研究的最后一篇重要论文”，笔者认为这种论断是因为撰者并不熟悉《法文研究》，该刊曾在一卷一期、一卷五期、二卷一期分别以韩波、魏尔伦、鲍特莱诺为主题，沈宝基、曾觉之等以撰文或者译注的形式对这些象征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做了详细且富有深度的探讨，参见鲍叶宁：《对文学现代性的追求：中法大学（1920—1950）校刊研究》，北京：外文出版社，2015 年，第 114 页。

② 在《法文研究》撰稿人员大都为中法大学留守人员，或在私立辅仁大学、私立燕京大学任职。鲍文蔚虽在伪北京大学教书，但似有隐情，参见姚小平：《波峰波谷间的鲍文蔚》，《老照片》第 49 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 年，第 7 页。